



百年 追求

——中国现代化方略的发展

赵剑英 主编

本书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审视自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艰难探索，探讨了中国在18世纪末期缘何逐渐衰落、20世纪后期如何走向复兴这样一个主题，是一本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思想简史。本书贯通历史与现实，以严谨的逻辑、理性的思考和富有激情、晓畅的语言，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地展示了近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对现代化艰苦卓绝的追求历程，逻辑地再现了中华民族摆脱屈辱和落后、追求独立解放和富国强民的精神苦难史和奋斗史。

中国干部
最新文库

中国干部最新文库

马 勇 主编



百年追求

——中国现代化方略的发展

赵剑英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百年追求——中国现代化方略的发展/赵剑英主编.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1
(中国干部最新文库/马勇主编)

ISBN 7-222-02995-8

I.百... II.赵... III. 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 D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2933 号

责任编辑: 张 维

装帧设计: 西 里

·中国干部最新文库·

百年追求——中国现代化方略的发展

赵剑英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开本: 850 × 1168 1/32
云南新华彩印厂	印张: 8.5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字数: 182000
	印数: 1—5000 册

ISBN7-222-02995-8/D·294

定价: 15.40 元

内容提要

本书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审视自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对现代的艰难探索，探讨了中国在18世纪末期缘何逐渐衰落、20世纪后期如何走向复兴这样一个主题，是一本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思想简史。本书贯通历史与现实，以严谨的逻辑、理性的思考和富有激情、晓畅的语言，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地展示了近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对现代化艰苦卓绝的追求历程，逻辑地再现了中华民族摆脱屈辱和落后，追求独立解放和富国强民的精神苦难史和奋斗史。

作者简介

赵剑英，1964年生，浙江萧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室编辑、副主任，新华社澳门分社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实践方法论和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迄今出版《哲学的力量——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哲学》、《复兴中国》、《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试析实践活动运行机制》、《从冲突和变迁中探寻新的价值世界》、《从衰落走向复兴》等论文40余篇。曾获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一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99年中国青年科技论坛优秀论文奖。

前 言

全球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向跨世纪的中国领导干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难得的发展机遇与严峻的挑战形势，要求中国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必须加强学习，以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必须掌握当代世界发展的各种新知识，更新知识和观念，以提高自身的领导素质。从总体上说，目前中国的干部素质还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必须从国家建设和民族兴亡的战略高度，解决中国高中级干部的学习问题，普遍提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也正因如此，我们组织了这套《中国干部最新文库》，力图为提高中国领导干部的素质尽一份绵薄之力。

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发现、分析、探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重大经济社会问

题，提出解决这些新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模式，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紧迫感和危机感来增强中国领导干部对时代的感受力、判断力和决策力，这是《中国干部最新文库》的宗旨之一。

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高度，介绍、分析、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概念、新知识和新情况，充实各级干部的学科知识，拓宽其认识视野，提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使中国的领导干部对外部世界保持快速敏捷的反应能力，这是《中国干部最新文库》的宗旨之二。

目前，坊间流行的干部读物并不少见，但真正适合中国干部需要的读物则不多见。何故？简言之，这些读物太拘泥于教条式的宣传与教育，很少有新的突破与创新，且多带有八股腔调，文字生涩，令人读之生厌。正是有鉴于此，我们这套《中国干部最新文库》在强调干部读本的现实性和理论性同时，特别注重读本的创造性和前瞻性；在注重读本的学术性、科学性同时，特别注重读本的普及性和趣味性。

我们的组稿思路是：对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和中国干部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实证性的分析，力求提出创造性的新阐释和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从人类全部历史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视野出发，总结、预测中国及世界社会发展的趋势及可能存在的问题；用通俗、准确、精炼、生动的语言，将国内外最新学术成果介绍给中国领导干部，使之获得思想上的启迪，并引发他们对中国现实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已有的干部读物大多按学科组织，按教科书编写。本文库不拟重蹈覆辙，而是充分相信中国领导干部已有的文化素养，不在常识问题上纠缠不休，而是尽量给干

部提供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这些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只要对我们新世纪的干部有一点启发，使我们的干部愿意就这些新知识继续学习，对这些新观念、新思想继续思考，那么我们的这套《文库》就算达到目的了。

为了保证这套《中国干部最新文库》的学术理论的领先性、选题涉猎的广泛性、撰稿队伍的高层次性，我们在北京邀请中宣部、中组部、国务院部委研究所、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有关专家进行了多次座谈，不断完善《中国干部最新文库》的策划方案和选题方向；邀请一批学有专长的中青年专家学者撰稿，并建立了严格的书稿审读专家负责制。

我们真诚地期望通过这套《文库》本身的魅力赢得中国领导干部的青睐，也真诚地祝愿跨世纪的中国领导干部通过阅读这套《文库》，成为走向世界的新一代政治家。

第一章	摆脱屈辱：中国现代化的起步	1
	走出辉煌：在屈辱中步入近代	3
	洋务运动：一场跛足的变革	13
	维新时代：中国怎样才能步入现代化的轨道	18
	新政：沿着维新的道路走下去	22
	革命：中国的唯一出路	25
	文化的觉醒：向东走，还是向西走	33
	三民主义：孙中山的现代化方案	35
第二章	光荣与坎坷：毛泽东的探索与失误	42
	换了人间	44
	艰难的探索	49
	严重的失误	53
第三章	拨正航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拓展	62
	切肤之痛的反思	63
	走出历史的沼泽地	68
	启动现代化的双轮	73
	打破森严壁垒：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	86
第四章	接着邓小平思考：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新创造	97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现代化的科学指南	99
	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	102
	接着邓小平思考	180
第五章	空前的创举：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191
	奇迹是这样发生的	193
	双重约束下的市场化	200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	204
	跨世纪的矛盾与选择	213
结束语	从衰落走向复兴：中国现代化的百年之路	239
后 记		259

第一章

摆脱屈辱：中国现代化的起步

☆清政府的禁烟决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既没有解决中西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更没有阻止中国的衰退，中国在鸦片毒品的蚕食下一步一步地走出辉煌，古老的中华帝国正像一个久食鸦片的烟鬼，正在日趋衰老。

☆洋务运动是 19 世纪下半叶中国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应变措施，它在短短的几十年之间却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生存状况。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尚没有新的阶级或政治阶层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社会的这场变革只能依靠中国传统社会中旧有的政治精英来领导。这批政治精英无疑具有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见识和理论高度，只是他们毕竟来自旧的阵营，因而，他们所主导的长达几十年的所谓洋务运动，说到底充其量不过是一场跛足的变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

☆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本欲为清王朝寻求一条解救之道，但由于传统的力量委实坚固，一旦改革真的从传统的夹缝中打开一条通路，改革本身却又犹如一条脱缰的野马，恣意驰骋，于是改革便走向自己的反面，不仅没有能从根本上为清王朝寻找到一条发展的坦途，反而使清政府因改革而陷入空前的危机状态中。

☆1901年1月29日，尚在流亡之际的清政府迫不得已地宣示“预约变法”，从而以自己的行动否定了戊戌政变以来的政治变革与经济变革不相配套的做法，而重新认同了光绪帝、康有为等人的危机意识和维新思想，承认政治体制的变革是一切变革的根本前提。应该说，由西太后亲自发动的这场新政，虽然被某些人视为假维新，但对西太后来说，毕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后党们”的真实想法，使她在戊戌政变之后的矛盾心情得到了真正缓解，也表明了她对百日维新运动的反省。

☆辛亥革命的主观目的无疑是为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它的崇高理想无疑是要推翻野蛮的专制集权政体，建设民主的共和国。然而崇高的理想毕竟代替不了、抵挡不住残酷的政治现实，中国只能在已有的轨道上继续前进。辛亥革命的那些志士仁人用鲜血和生命所换来的除了“中华民国”那块空招牌外，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并没有因为“革命”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五四一代对民主政治的热情与渴望无可厚非。民主政治也许不是人类最好的制度，但它毕竟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所发现的最不坏的制度。因此，在一定历史阶段，民主政治确实值得中国人去追求，也值得中国人为之献身。不过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五四一代思想家在分析民主政治何以在中国不能成为现实时，未免太过于看重人为的因素，而相对忽略了从社会经济结构中去寻求

民主政治得以产生、发展的根源，没有能从经济生活中揭示民主政治在中国发展的根本障碍。

毛泽东说过，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说孙中山好得很，漂亮得很，和林黛玉、杨贵妃差不多，美得很，不是的。我们走得是马克思主义的路，是历史辩证法的路。孙中山的确做过一些好事，说过些好话，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但是，我们和孙中山还有区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

走出辉煌：在屈辱中步入近代

大约相当于 15 世纪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极大刺激了当时一些西方国家竭力向海外寻求贸易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明孝宗弘治十年，即公元 1497 年，达伽马率领 4 艘船绕过南非好望角首航印度，从而打开了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东方的秘密遂被西人开始真正知晓。

1511 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

1514 年，葡萄牙商船第一次抵达中国广东海岸。中国人据此第一次真正知道西方世界，只是对葡萄牙人的称呼还是借助于阿拉伯人对葡萄牙人的称呼，称其为“佛郎机”。

过了四十年，1554 年，葡萄牙人终于以贸易的名义进入中国广东浪白澳；又过了几年，葡萄牙人终于通过行贿的手段于 1557 年取得在澳门建房的居住权。中国由此开始和西方和平通商，双方除了商业方面的利益

百年追求 外，似乎在其早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政治、军事冲突。

伴随着西方商人的船队，西方传教士也开始了向这块神秘的土地“传播福音”的艰难历程，他们期望通过他们的奋斗，能给东方人带来幸福与信念。1541年4月7日，耶稣会创办人之一圣方济各·沙勿略带领一批传教士携带《圣经》和十字架，在舰队及大炮的护送下离开里斯本，前往远东。1549年8月抵达日本，他们在那里遇到有极高教养的中国人，于是更使他们相信中国人具有接受福音真理的资质，更坚定他们前往中国的决心。1552年8月，沙勿略终于抵达距广州30海里的上川岛。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当时的明王朝严禁外国人登陆，沙勿略在上川岛遂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久又害了一场热病，并于同年12月2日病死在该岛。

沙勿略没有真正进入中国本土，但他的努力激励着他的同道顽强奋斗，终于撞开中国紧闭着的国门。当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耶稣会便以此为据点，想方设法向中国内地渗透。1562年，皮莱士和戴西拉在澳门定居，卡纳罗出任澳门第一任大主教，并选派比较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的范礼安、罗明坚、巴范济和利玛窦4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到澳门，寻求机会进入中国内地。后来，范礼安、巴范济两人先后在澳门死去。罗明坚、利玛窦两人在得到广东地区行政负责人陈文峰的批准后，于1582年终于进入中国内地，在肇庆的天宁寺居住，正式传教。此为西方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在经历了元代回回教的消失之后再一次正式进入中国。中西文化之间开始真正的交流。

罗明坚在肇庆的传教为时甚短。倒是与罗同行的利玛窦开始有意识地与中国地方各级官员尤其是文人的交往，在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之后开始向他们宣传欧洲的文

物与典章制度，并在叙述各国不同的宗教仪式和宗教信仰时巧妙地加入中国人当时还不知道的有关基督教圣迹方面的内容。通过利玛窦的努力，中国在短短的时间里，竟有相当一部分人改变自己原先的信仰，转而信仰外来的基督教。据估计，自利玛窦 1583 年开始在肇庆收受第一名信徒始，至 1610 年这短短的几十年中，仅经过他受洗的信徒就有 2500 名之多。全国的信徒更是不计其数。受洗入教的知识分子中竟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李天经、冯应京以及王徵等这样著名的朝中大臣及官僚。

像徐光启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放弃中国传统的文化信念与宗教信仰而接受基督教，除了宗教、文化方面的原因外，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就是当时的明王朝虽然国势衰弱十倍于宋末，虽有天崩地解之虞，但其国势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国内政治格局中，尚没有什么新的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正是这种老大帝国的传统惯性和老大帝国的文化心理，使得明王朝在面对外来异教时能够采取一种相对说来还算宽容的政策，明王朝并没有因为士大夫阶层有人信仰异教而恐惧。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还算比较正常地在进行着。

以正常的心态进行文化交流对双方都有利。在明清之际，传教士受中国文化的感染，向西方提供了不少有关中国的真实可信的社会文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开展，中国古老的文明在为人类的整体进步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在中国，由于统治者和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能以比较正常的心态来对待中西文化，能够坚持取长补短的文化交流宗旨，充分利用西方来华人才，大度吸收西方科学文化，同时在以不影响国家安全，不妨碍国家利益

的前提下，适当允许传教士开展正常的传教活动，使中国文化通过吸收西方文化而获得一定程度的新的发展。据杨廷筠 1623 年为艾儒略《西学凡》所作的序言中说，当时已经运抵中国的西方文、理、医、法、教、道等各方面的书籍约略有 7000 余部，他们计划集中数十人以十年之力系统地将之译成中文。此一计划如真能如期实现，中国文化的内含必将获得丰富与发展。

然而遗憾的是，文化的发展无法制约政治的变动，而政治的变动却每每影响文化的发展。当中西文化的交流正要紧锣密鼓地开张之际，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动却将这一计划彻底打乱。1644 年 3 月 19 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占了明王朝的首都——北京，对西方文化怀有一定程度好感的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明王朝灭亡了。同年 5 月 1 日，满清的军队进入北京，颠覆了李自成的农民军政权，满族人所建立的清王朝开始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清王朝在中原立足之后，出于社会发展的一般需要，对于明王朝对西方文化容忍和吸收的态度在起初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在顺治、康熙的时代，清政府对西方传教士依然是优礼有加。为明王朝几乎竭尽忠心的汤若望依然受到新王朝的信任，奉命与龙华民“依西洋新法”测验天象，改订历法。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依然按照过去的情况在向中国人传播着基督教福音。然而，到了清王朝发展鼎盛时期的康熙年间，中西文化之间却因人事方面的原因发生了一场极为激烈的争论。1704 年，教皇克莱孟十一发布禁令，明确规定中国基督教徒不得在家祭祀祖先和孔子，1707 年，多罗特使在南京公告这一决定，遂引起中国方面的激烈反对，清政府一面驱逐法国人颜珣出境，一面将多罗特使解往澳门拘禁，并令各地教士均应声明遵行利玛窦成规，并领取居留证，

违者驱逐出境。

1715年，罗马教廷重申严禁中国教徒奉行祭祀祖先和孔子的礼仪，并要求在华转交传教士宣誓遵守，这进一步激化了清王朝与罗马教廷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其他某些文化方面的误读与误解，康熙皇帝终于下达了禁教令，规定西方传教士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方面的特别准许前，一律不准在中国传教，违者一律驱逐出境，严厉地禁止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免得多事”。

继康熙之后君临中华帝国的雍正皇帝，在对待西方传教士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他继位问题的影响。不论他是否是杀父继位，但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里，他一直忙于镇压他的反对者则为事实。他不喜欢传教士，因为传教士中的一些人曾经在他继位问题上明显地站在他的反对者一面。他虽然宽恕了在北京的一些高层传教士，但对在外省的一些传教士则采取了比乃父时期更为严厉的限制措施。而且，随着中西文化误读误解的不断增多，雍正皇帝终于在1724年痛下决心，通令各省：凡国人信西教者，当改信他教，否则处以极刑。后经在朝耶稣会士的奏请，允许诸省教士暂留广东，以便能与其本国通信，逐渐回国，遂准诸教士在广东永久居留，各省先后到达广东的教士有300名之多。

中西文化的交流并未因朝廷的禁令而骤然中断，到了雍正皇帝驾崩的那一年，即1735年，仅江南受天主教洗礼者就有1072人。中国人信仰西教者屡禁不止，于是乾隆元年再禁国人信西教：凡国人信奉西教者当立即弃教，否则无论旗人、汉人，一律处以重刑。严禁留居北京的传教士借传习天算历学而劝人入教。

伴随着中西文化方面的冲突，是中西经济交往的不

平衡。中西之间的贸易对于清王朝来说在当时或许太重要，但对西方这些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任何的不平衡都有可能导致新的危机。于是随着中西贸易不平衡的扩大，英国人于 1727 年即雍正五年，首次向中国输入鸦片 200 箱（每箱重 133 磅）。是为西方国家向中国输入鸦片之始。

鸦片贸易或许弥补了中西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是它不仅使中国的大量白银流往西方，而且给中国人带来了远非物质方面的损失，它给中国人身心带来极为严重的伤害。于是仅两年之后，清政府即于 1729 年首次公布禁止吸食鸦片的规定。

清政府的禁烟决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既没有解决中西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更没有阻止中国的衰退，中国在鸦片毒品的蚕食下一步一步地走出辉煌，古老的中华帝国正像一个久食鸦片的烟鬼，正在日益衰老。

西方人向中国输入鸦片显然是不道德的，但是究竟怎样才能真正解决中西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也应该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可惜的是，老大帝国的心理使他们既不愿正视这些问题，也无力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正如马戛尔尼的随员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所说的那样：“大家都知道，英国是一个商业国家，商人是社会中最活跃最富裕的组成部分。商人的利益和活动随时受到政府极大的注意，并在许多方面影响政府的措施。因此，英国派遣一个使团到中国访问，自然是为了商业的目的而去的。事实上，中英两国交易往来的情况确实也应当有所改变。自从英国初到中国开辟市场之日起，以及以后两国发生贸易关系以来，没有一件事情有助于改善英国人在中国的地位，而其他欧洲各国商人在